

第十辑

大足文史

胡绳



政协大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 足 文 史

第十辑

政协大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4·10·

主 编:周寿国

副 主 编:于发明

文史委主任:李正心

文史委副主任:谭文华

文史委员:毛天敏 邓之金 李传授 何大华 余开和

陈 良 陈明光 周思德 梁自能 蒋光华

覃长才

编 辑:李正心 谭文华

2064/42

目 录

红三军参谋长 唐赤英传略·····	李正心(1)
虎穴巾帼饶国模·····	陈先学(44)
八载成功大后方 红岩托足少栖惶 ·····	钱之光 童小鹏 刘昂 牟爱牧(79)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夏静 王文哲(87)
忆倪永业同志·····	梁自能(100)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蒋焕新·····	梁自能(105)
忆大足第二任县委书记吴仕英同志·····	欧翥翔(108)
忆四川大学顾问赵念非教授·····	赵宗虞(118)
细中见大 平凡生辉 ——忆方间农同志·····	葛文泉(126)
名医李彦师·····	陈明光(134)
李彦师的主要学术思想·····	陶必贤(136)
名医黄克用传略·····	张划 谭先柱(155)
忆黄克用老先生·····	于发明(201)
回忆黄克用老师·····	周文焕(204)
杏林望重六十秋·····	黄仁第(206)
马大群为水利事业献身·····	陈明光(211)
名医杨谦受·····	陈明光(215)
考察和研究大足石刻的奠基人——张澍·····	陈典(218)
大足女诗人——沈蕊仙·····	陈典(223)
余栋臣的晚年·····	胡齐畏(228)

红三军参谋长 唐赤英传略

政协大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共大足县委党史研究室

李正心执笔

唐赤英，原名唐子文，上学时又名世焕，字泽英，参加革命后更名赤英。

据《唐氏族谱》记载：赤英生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初六日（公元1903年11月24日），系川东道重庆府大足县福元里（即今石马镇实干村七组）人氏。

他的住居至今犹存，座落在石马镇一带青山脚下。一排正房，两边厢房，中间是晒场，屋后竹木蓊郁，门前一条冲，全是葱绿的庄稼地。地名月塘湾。赤英小时候放牛割草，读书种地，就在湾里。

唐赤英的父亲唐鸣昌，生四男（赤英排行第四）二女（一个是赤英的姐姐，一个是赤英的妹妹）。世居本地，种田为生。祖上留下一百四十挑谷子的田地，归唐赤英的父亲和伯叔所有。为供唐赤英读书，卖了部分田土。其后，叔伯们分家，虽勤耕苦作，经济仍然拮据。

赤英的父亲唐鸣昌，正直公平，勤俭持家。好岐黄之术，

精于眼科，有求必应。封建时代的农村，卫生条件差，患眼病的人往往视为小病，延宕许多时日才寻医生。唐鸣昌总是耐心医治。无钱的病人找上门来，他不收药费，有时还送药上门。他的医德医术受到乡邻的赞誉。每逢初一、十五，常到街头讲“圣谕”。所谓讲圣谕，是旧时一种通俗的民间宣传文艺活动。常在街檐边两张条凳上置一方桌，讲圣谕的人焚香叩拜当今天子牌位之后，登上高台，摇动铜铃，召来听众，然后讲说故事。内容是忠孝仁义，惩恶劝善。唐鸣昌讲圣谕劝世人，他自己乐善好施。既种田又行医，晚年还落得个债务缠身，忧劳成疾。

赤英的母亲邓玉贞勤俭善良，慈祥忠厚。她信佛，每逢朔望日，就到佛寺去拜佛念经，吃过花斋，随后吃长素，有二十几年。

唐赤英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的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天资聪颖，喜欢读书。先在本村月塘湾读私塾。那是由胡家和唐家等四家人联合办的。聘请塾师胡辉伍，学生有唐子文（即唐赤英）、唐均国、唐伯渊、李楨源、胡伯廷、荣树青、荣子周等十余人。就在入私塾之后，唐子文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唐泽英。一年以后转到拾万场文昌宫私塾读书。住在舅爷邓仁山家里，读了两年。后来到万古镇高等小学堂读书。学校设在大雄寺。那个时代，一般农村没有专门修建学校，学校常常设在乡院子里或寺庙里。

唐泽英聪明勤奋，好学不倦，在班上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老师喜欢他。在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当了级长（班长）。

他读的书很多，最初启蒙，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其后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尚书》、《古文观止》等。他喜欢古文，常高声朗诵，毫无倦意。

长于作文，受到老师、同学的夸奖。

他的品德好，尊师重道，团结同学，热爱集体。父亲教他以耕读为本，书要认真读，农活也要干好。下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放牛割草，或田间把锄，坡上捞柴。放牛的时候，牛在一傍啃青草，他就抽空掏出书来温习，用柴棍在地上写生字，或者默想老师讲解过的课文。

有一次，他坐在草坪上，思考老师讲过的课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想：宣统皇帝被推翻了，又出现军阀混战。怎样才能象《大学》说的那样去“新民”最后达到“至善”呢？正想得入神，突然听到远处有小孩子大声呼叫的声音，其中有人“哎哟哎哟”地叫唤。一定出了什么事了。他立起身来，朝着有人声的地方跑去。

在那边崖坎下，有个小孩从牛背上摔下去把腿摔伤了。另外两个拾柴禾的孩子打算把他扶起来，摔伤的孩子站不得，一个劲地叫唤。

“别动他！别动他！”唐泽英大声制止。“我来看一下。”

唐泽英蹲下去一看，摔伤的孩子是本村的三娃子。受伤的左腿有一处凸了出来，青肿一大片。那里伤势重，轻轻触动一下就嚷痛。可能是骨折。

怎么办？背他去万古镇上找外科医生。他把身子爬在地上，抓住受伤孩子的两手，把他驮了起来，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万古镇，找到医生，给三娃子接上骨头。包扎完毕，三娃子的父母才闻讯赶到，感激不已。唐泽英浑身热汗淋漓，一面揩汗一面说：“我跑路跑惯了，不累的。”

青少年时代的唐泽英，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喜欢思索一些大道理。有时提出一个问题来，老师、长辈都答不上。为

什么穷人要受苦？为什么庄稼人脸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活种粮食，到头来，他自己却没粮食吃呢？”

父亲教他重视耕读二字，他也确实做到勤耕苦读。但又提出疑问，勤耕的人难免冻饿而死，苦读的穷书生还不是一年比一年穷，这是什么原因？

父亲讲圣谕，母亲奉佛。他们都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豪绅恶霸干坏事享不尽的福，穷苦人做好事受不完的罪？真像《窦娥冤》中的主人公唱的那样：“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耕与读都难免啼饥受寒，死于沟壑，我的出路在哪里？大家的出路在那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理解更深人，疑问越来越多，疑团越来越大。

月塘湾当时为现今的万古区属地，（现在属石马镇），万占、雍溪一带的人下重庆的多，或寻出路，或做生意，或求学。返乡之后，带回一些洋货，也带回一些城市见闻，什么铁做的船，放在河里不沉底，还跑得飞快；铁做的洋马儿不吃草，不喝水，还让人骑。乡下人听了半信半疑。军阀混战，遍地狼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横行霸道；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狼狈为奸。父老们听了，叹息一番，生在乱世，实在是命运不好。

唐泽英在田边地头歇气的时候，读书作文之后静下心来，兀自出神，苦苦思索一个问题：庄稼人的出路在哪里？

他回答不出。长辈、老师也回答不出。孔子的书读了那么多，也找不出答案。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产生了：外出求学。

1919年春天，他去重庆考上了西南公学。在那里生活更俭朴，常常是腰无半文，踽踽街头。饿着肚子，在图书馆里看书。重庆使他开了眼界，花花世界，光怪陆离。人声嘈杂，市场喧嚣。重庆是水码头，各地客商带来各地的货物，货栈堆得山一般高。小火轮在长江上卜卜卜地响着前行驶，其速度远远超过木船。碧眼金发的洋人随着洋枪洋炮、鸦片烟、十字架一同登上朝天门码头。

透过山城的重重迷雾，他看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一掷千金的纨绔子弟，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工厂里的穷困潦倒的工人，街头上拾破烂无家可归的穷汉。这种现象与他的家乡月塘湾比较，与万古场比较，都有相同之处。过去，他在月塘湾曾这样想：庄稼人的出路在哪里？如今在重庆，又出现类似的问题：穷汉们的出路在哪里？

在重庆，读书多了，不但没能解开疑团，反而在思想上蒙上了更深一层迷雾。古老的中国正处于非常的时期：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务之急是救国。要象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忠于国家……

戊戌变法六君子怎么样？他们是忠于皇上的。变法是为了国富民强，可偏偏失败了。

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帝制，可后来又出现了军阀混战。

救国，救国，怎样救呢？从社会舆论报纸杂志上看到有种种主张，有说实业救国的，有说教育救国的，还有提倡读经救国的。城市的实业与教育不就相当于农村的耕与读吗？从耕读中，他看不到庄稼人的出路；从实业与教育中，也看不到穷哥们儿的出路。至于读经救国，他更不信。所读的经书告诉他：

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孟夫子并未替现在的人设计一套救世方案。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提倡尊孔读经,可他面对顽固的西太后就奈何不得。读经有什么用!

同学中,他与安岳县的钟云七最要好。两人多次屈膝谈心,讲到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时,常激动不已,骂一通军阀卖国贼,议论一番时事政局。痛恨之余,常又扪心自问:救国,我该做些什么?

他俩认为:要献身祖国,可学习军事技术,反击侵略,抵御列强;也可以学习军械制造,生产大炮、战舰,巩固国防。

1923年,西南公学毕业,他们结伴回家。钟云七到唐泽英家里作客,受到唐家热情欢迎。他俩摆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从鸦片战争、庚子赔款,谈到如今的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如再出现史可法、郑成功这样的忠臣良将,中国可救。为此叹息不已。

他们畅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上午,钟云七告辞唐家老小,回安岳县去了。

唐泽英和同学在家中畅谈,家里人也听到一些,知他立志报效国家,不久将远走高飞。父母赞成儿子的举动,他们有一桩心事尚未了却,圣人以忠孝治天下。“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矣!”古先贤有过训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四远行之前,应先娶妻生子,接续香烟。

经亲戚作媒撮合,唐泽英与拾万场胡家湾李箴修之女定亲。两家的父母都同意。唐泽英少年时代曾随父母去拾万场经楼坡看人们做“会”。这种“会”是属于民间佛事活动,很闹热的。李箴修夫妇也参加过拜佛,见过唐泽英,印象好。唐泽英听从父母的意见,同意这门亲事。经过择期、讨庚、插香等两家

结为秦晋之好。结婚时间定在当年(1923年)冬月初。那年月匪患猖獗,月塘湾地势偏僻,怕土匪趁火打劫,搔扰宾客,结婚地点迁至杨角岭建佛寺附近杨济州院子。婚后不久,仍迁回月塘湾老屋基居住。

唐泽英毕竟是胸怀大志的人,恋恋不忘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自己急于寻求一条出路,一条投身于救国事业的崎岖的不平之路。这条路在什么地方,怎样走,他不清楚,甚至是模糊的。屹立在他面前的英雄人物时时在呼唤他,那些人物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

婚后一个月,他便向爹娘说,要去远方求学,报效祖国。爹娘理解他,知他非池中物,早迟都要远走高飞。不过,刚结婚就动身,也太仓猝了一些,动员他再留一些时间,等到有了后嗣再启程。新婚妻子挽留他,劝他暂缓行程,并表示理解丈夫的心情。

他决定暂留一些时候,于是安心住在家里。白天随父兄下地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苦读。妻子也在灯下做些针线活。有时候,他放下书本,为年轻的妻子讲些英烈人物事迹,讲到慷慨激昂之际,不禁奋袖掀臂,抚膺长叹;讲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时,又十分沉痛,恨不能以身报国。妻子受了感动,对他更理解了。

1924年(甲子年)11月7日,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他取名唐一,书名唐正格。添人进口,合家欢庆。打“三朝”的时候,唐泽英再次提出要出外求学。家中老小都知道,他决心已下,矢志不一,不再挽留,决定给他筹办路费,整治行装。

在儿子唐一满月那天,唐泽英按照旧时礼节在堂屋焚香点烛,拜了祖先,告别爹娘、妻子,并向全家老小、亲朋故旧辞

行，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唐泽英离家时所带的盘缠，是父亲唐鸣昌向别人借的。泽英去后不久，债主纷纷上门收款。唐鸣昌与全家人商议解救燃眉之计，决定邀个五千吊钱的田园会。应邀打会的都是至亲好友。唐鸣昌邀会，当然是首会，所接的会钱全部用来抵债都不够。

债主要讨债。唐鸣昌全家人坐下来经过三番五次商议，下狠心把月塘湾的田土及学堂草房全部卖出，只留现在住的院子。没料到，买田的看中了他们几弟兄的住房，要买，就连他们现住的房子一并买，只留学堂草房给他们几弟兄住。一大家人怎么挤得下？全家人再次商议，决定了一个新方案——分家。

田土房屋按四股分，每房分得二十五挑谷子的田。欠下的债也按四股分摊，每房人负债一千多吊钱。老大，老二迁出老家，教私塾去了。唐鸣昌夫妇领着三儿、三儿媳妇、四儿媳妇（唐泽英之妻）住在一起，仍以种田为生。

他们的生活很苦。等待着唐泽英衣锦还乡改换门庭。

二

谁也没料到，唐泽英离家之后，再也没回来，月塘湾的人没再见到他的身影。

他只给家里通过信。几次通信，都告诉家人：国家有灭亡之患，没有国怎能有家？我走之后，家里欠了债，大家生活都苦。苦难的家庭到处都有，不只我们一家。我们要为国家出力效劳。他告诉家人，他在武汉读书，学成后报效国家。

第二年（1925年）唐泽英从广州寄去家中一封信，他已考

进黄埔军官学校。他留在武汉的一口大书箱放在同乡、当兵驻武汉的唐香成那里，求父亲遣人到武汉把书箱挑回家去。唐鸣昌派唐会昌、江成之二人去武汉。唐会昌途中生病死亡，江成之一人把书箱挑回家中。

唐泽英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给家里写过两封信，附有照片。（书信和照片在民国时期迫于政治压力，被唐泽英二哥唐世林烧毁了。）黄埔军校毕业后，也给家里通过信。全家人都希望他回家探亲。但是，他的回信从不提及回家的事。信中恳求双亲大人不要挂念他。家里有大哥、二哥、三哥和幺妹，他们会照顾父母的。爹娘只当少生我一个，儿子在外，为国忘家，实在顾不上你们了。如夏禹之疏通九河，三过家门而不入。

家里人不知道，唐泽英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在什么单位工作，干些什么，他在信中也没具体讲，只说他现在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的信中没提好友钟云七的情况。

1926年10月，家里人收到唐泽英的信，说他在黄埔军校即将毕业。此后无消息。1928年，家中收到唐泽英从俄国寄回来的信。据唐泽英的外侄李祯源老先生回忆，他见过那封信的，附有一张照片，在一辆敞篷车上坐着五六人，只认得其中一人，那就是唐泽英。

唐泽英在信中讲了家庭和他通信的办法，寄俄文的信，信封上要写俄文。家中人不会写，他便写了几张封面。要给他通信，只消把封面贴上信封就行了。寄信不能在本地寄，要托人带到重庆或成都寄，他在遥远的俄国才能收到。

唐泽英寄回的信封封面，家庭妥为保存。在重要关头的时候，才寄一封信。他父亲病重，去过一次信；父亲、母亲先后病放，各去一封信。

每次去信，唐泽英都收到的，都回了信，安慰长辈，鼓励晚辈。要求年青人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决不要误入歧途。

唐泽英在俄国干什么？信中从未提及。

唐泽英的妻子李氏盼望丈夫回家，思念甚切，更因生活困难，于1928年11月4日在家悬梁自尽，年仅24岁。遗孤唐一，只有四岁，由叔父母抚养。

家中的亲人把李氏自尽的不幸消息写信寄给唐泽英，用了最后一个有俄文字迹的信封封面。唐泽英回了信，哀悼亡妻，托兄长抚养唐一，长大成人，报效国家。

以后，唐泽英没再写家信。他寄回家的信封封面已用完，家中没法给他通信。从此音讯杳无。

唐泽英为什么不再给家里写信呢？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查、抓捕共产党人的时候。唐泽英怕连累家人、亲友，因此不再通信。他曾在信中对父母说过，“就当没生他这个儿子一样”，他已立志献身革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唐泽英的亲友中也有入敏感到这一点。唐泽英的舅舅邓子孚在大足团练局当师爷，有一次，见国民党抓赤色分子的风声甚紧，便派人连夜赶到唐家送信，务必要把唐泽英寄来的信件、照片及有关的东西全部烧掉，不留一物。如被清查出一物，全家受寄，重则杀头。希千万注意，决不可疏忽大意。唐泽英二哥唐世林闻讯后，迫于政治压力，当夜就将有关信件、照片等物全部烧了。

从此，再也没有唐泽英的消息。

解放后，经多方打听，仍然没有唐泽英的消息。他究竟到哪儿去了，是否还在人世，都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直到九十年代才找到了谜底。

1991年2月湖北省军区军史编辑室给中共大足县委党史研究室来函说，为编写《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卷》请查证唐赤英是否为唐泽英。并附寄了有关唐赤英的资料。

资料一。《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上记载着唐赤英的情况：“政治科大队，唐泽英，22岁，四川大足万古镇转拾万场。”

资料二。唐泽英生前战友，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贺彪给湖北省军区军史资料编辑室的信函。信中说：

关于你们询问有关唐赤英烈士的情况，现就我了解的情况答复如下：

一、唐赤英烈士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校时名字叫唐泽英，后到洪湖苏区亦改名为唐赤英。因此，唐赤英就是唐泽英。他当时是中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我是红三军的军区处长，故对唐赤英烈士十分熟悉。因此，这一情况是确实的。……

大足县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经过多方查证终于查到了唐赤英出生地石马乡实干村（二十年代属万古场管辖），找到了他的亲属（儿媳，孙儿等）翻阅了家谱。的确，唐泽英就是唐赤英。

据《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载事实，唐泽英1926年1月7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团，1926年10月4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

唐泽英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进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在班上当过中共支部书记。与刘伯承同学。两年后归国。从此更名为唐赤英。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代理政委。他是从武汉动身，在“交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湘鄂西洪湖根据地。他于1931年3月给中央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于十六日午后三时安抵松甫家。松甫须马上搬家，特委交通说石首失守白军离调关（特委所在地）只三四十里，特委已由调关向洪湖移动；因此我须于明日离汉，单独向苏区去。”信中还谈到“交通”不灵便，应加强武汉与鄂西的“交通”问题以及为苏区购买子弹、枪支、机器（兵工厂用的）等问题。信末说：“请你们速买十个到五十个指北针送来。你们给我的望远镜，请德峰兄速设法寄我。”

唐赤英于1931年3月下旬到达湘鄂西根据地。由于湘鄂西特委机关已移至洪湖，他首先到达的地点就是洪湖。

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以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起来的。

南昌起义后，部队南征。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军与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连续作战，在潮汕地区失利后，党决定贺龙离开部队。他到了上海。中共中央根据他的请求派他回湘鄂西发动武装斗争。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七人到了湘鄂西。他们以毛泽东领导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开展武装割据。1930年七月，建立了红军第二军团（即红三军前身），以洪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发展。红二军团以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

政治委员(周于 1931 年牺牲)。部队很快扩大到两万多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包括湖北省洪湖革命根据地、湘鄂边根据地、巴归兴根据地(巴东、秭归、兴山县部分地区)、鄂西北根据地、鄂北根据地、荆当远根据地(荆门、当阳、远安、宜昌等地)、枝宜根据地(枝江、宜都等地)、洞庭湖特区。这些区域之间,有的虽然没完全联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或稍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湘鄂西根据地的整体。

湘鄂西根据地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构成了对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在“立三路线”推行时,苏区遭到重大损失。由于“立三路线”持续时间不长,贺龙、周逸群及广大干部的抵制,弥补了损失,湘鄂西苏区有所发展。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比第二次“左”倾更“左”。三月,中央派执行“左”倾路线的夏曦同志到洪湖,二十七日成立了以夏曦同志为书记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清算立三路线之后,按照新的“左”倾路线来进行工作。当时,洪湖根据地即将开展反“围剿”斗争。夏曦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几次给红二军团发出指示,催其返回洪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说:“遵照中央决定,撤消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前来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同志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指示,彻底转变二军团政治路线。”“依照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前委应取消,由总指挥、政委负全军责任,在必要时可开军事会议。二军团改编为第三军,共编两师,仍